

■ 最藍的眼睛

这就是那所房子，绿白两色，有一扇红色的门，非常漂亮。这就是那一家人，母亲、父亲、迪克和珍妮就住在那所绿白两色的房子里，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看见珍妮了吧，她穿着一条红裙子。她想玩，谁会 and 珍妮玩呢？看见小猫了吧，小猫喵喵地叫。过来玩呀，过来和珍妮玩呀，小猫不愿玩。看见母亲了吧，母亲很和善。母亲，你愿和珍妮玩吗？母亲大笑。笑吧，母亲，笑吧。看见父亲了吧，他又高又壮。父亲，你愿和珍妮玩吗？父亲笑了。笑吧，父亲，笑吧。看见小狗了吧，小狗汪汪地叫。你愿和珍妮玩吗？看见小狗跑了吧。跑吧，小狗，跑吧。看那，看那，来了一位朋友。他愿和珍妮玩。他们要玩一个有趣的游戏。玩吧，珍妮，玩吧。

这就是那所房子绿白两色有一扇红色的门非常漂亮这就是那一家人母亲父亲迪克和珍妮就住在那所绿白两色的房子里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看见珍妮了吧她穿着一条红裙子她想玩谁会 and 珍妮玩呢看见小猫了吧小猫喵喵地叫过来玩呀过来和珍妮玩呀小猫不愿玩看见母亲了吧母亲很和善母亲你愿和珍妮玩吗母亲大笑笑吧母亲笑吧看见父亲了吧他又高又壮父亲你愿和珍妮玩吗父亲笑了笑吧父亲笑吧看见小狗了吧小狗汪汪地叫你愿和珍妮玩吗看见小狗跑了吧跑吧小狗跑吧看那看那来了一位朋友他愿和珍妮玩他们要玩一个有趣的游戏玩吧珍妮玩吧

这就是那所房子绿白两色有一扇红色的门非常漂亮这就是那一家人母亲父亲迪克和珍妮就住在那所绿白两色的房子里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看见珍妮了吧她穿着一条红裙子她想玩谁会 and 珍妮玩呢看见小猫了吧小猫喵喵地叫过来玩呀过来和珍妮玩呀小猫不愿玩看见母亲了吧母亲很和善母亲你愿和珍妮玩

吗母亲大笑吧母亲笑吧看见父亲了吧他又高又壮父亲你愿和珍妮玩吗父亲笑了笑吧父亲笑吧看见小狗了吧小狗汪汪地叫你愿和珍妮玩吗看见小狗跑了吧跑吧小狗跑吧看看那来了一位朋友他愿和珍妮玩他们要玩一个有趣的游戏玩吧珍妮玩吧

1941年的秋季，金盏花没有出芽。对此我们都缄口不言，心照不宣。当时我们以为金盏花发不出芽是因为佩科拉怀了父亲的孩子。其实多几分观察少几分伤感就能证明不仅我们的种子没有发芽，别人的种子也未发芽。连湖边花园里的金盏花那年也未发芽。可是由于我们对佩科拉的健康以及她孩子的平安出世极其焦虑，脑子里整天想的只有我们自己的魔力：假如我们撒下花种后接着说上几句吉利的话，种子就会发芽，一切也就太平无事了。

很久以后，姐姐和我才承认我们的花种是发不出绿芽来了。一旦认识到这一点，悔恨即被吵架代替，互相指责，认为责任该由对方承担。很多年以后我还一直认为姐姐的话是对的：是我的过错。我把种子埋得太深了。我们俩谁都未意识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贫瘠了。我们把种子撒在自己的一小块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亲把他的种子撒在他的黑土地里一样。我们的幼稚与期盼和他的兽欲与绝望一样的一无所获。现在清楚了，在那些希望、恐惧、情欲、悲痛中惟一留存下来的只有佩科拉和那贫瘠的土地。乔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们的纯真稚气也死了。种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

其实再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问一个为什么。然而，由于很难说清为什么，只能借助于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 秋

在希腊旅馆的前厅里，嬷嬷们的脚步和欲火一样悄然无声，而喝醉了酒的男人和机敏的眼睛一齐唱着歌。罗莎玛丽·弗拉努奇是我们的隔壁邻居，住在她父亲开的咖啡店的楼上。此刻她正坐在1939年的别克牌小汽车里吃着黄油面包。她摇下车窗对我姐姐弗里达和我说我们不能上车。我们瞪眼瞧着她，想要她的面包，但更想把她眼光里的傲气给抠出来，打掉她翘嘴吃东西时流露出来的拥有财富的自豪感。等她从车里出来时我们要痛打她一顿，在她白晰的皮肤上留下红印儿。然后她就会大哭，问我们是否要让她脱裤子。我们会说不要。如果她真脱，我们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但是不管她怎么央求我们，我们知道她总是在向我们进贡她最为珍贵的东西。而我们必须拒绝她的进贡，以表示我们的傲气。

开学了，弗里达和我有了新的棕色长筒袜和鱼肝油。大人们在一起神色不安地谈论着锡克的煤炭公司，嗓音里充满了倦意。到了晚上，我们跟着他们到铁路沿线把散落在地上的小块煤炭拣进麻袋里。之后我们走回家，回头看着整车的煤渣被卸在铁厂四周的深坑里，红通通的，仍在冒着烟。将熄的火焰把天空染成暗暗的橘红色。弗里达和我落在后面，望着被黑暗包围的一点光亮。当双脚离开铁道的石子路踏进田里的枯草时，我们禁不住打了个寒战。

我们住的房子是绿色的，又旧又冷。到了晚上只有大屋里点了盏煤油灯，其他屋子则充满了黑暗、蟑螂和老鼠。大人们不和我们说话——他们只发布命令。他们只管发号施令而不加以说明。我们绊跤摔倒时他们向我们瞪眼；我们割破摔伤时他们就说你们疯了吗；我们要是感冒着凉，他们就不耐

烦地连连摇头，认为给他们添麻烦了——他们会说如果你们都病了，大人还怎么干活？我们无言以对。用来治疗感冒的药是厌烦的态度，气味难闻的黑药水，以及让我们昏昏欲睡的蓖麻籽油。

有一天，拣完煤渣回来，我大咳了一声。咳嗽声是从早已充满痰液的支气管里发出来的。母亲皱起了眉头。“上帝啊，赶紧上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把头包起来。你肯定是这镇子上最大的傻瓜。弗里达，找些旧布把窗户缝堵上。”

弗里达把窗户缝又堵了一遍。我有气无力地上了床，心里充满了内疚与自悔。我穿着内衣躺下。尽管袜钩弄痛了我的腿，我也不愿意把长袜脱掉，因为光着腿躺着实在太冷了。过了很长时间，身子挨着的那块地方才暖和过来。一旦把那块地方焐热了我就不敢动了，因为身子四周半英寸之外的地方都是凉的。没人跟我说话，也没人问我感觉如何。一两小时之后母亲进来了，她的手又大又粗糙。当时用软膏在我胸上来回揉搓时，我疼得绷紧了身子。她用两个手指一次抠一大块油膏，在我胸上按摩直到我晕过去。正当我痛得要叫出声来时，她用食指又抠了一小块塞进我的嘴里，让我吞下去。她用暖烘烘的绒布毯子把我的脖子和前胸裹起来，然后压上沉甸甸的被子，命令我发汗。很快我就出汗了。

之后我吐了。母亲说：“你干吗吐在床单上啊，你难道不知道要把头探出床沿吗？看看你干的好事。你以为我没别的事好干只给你洗脏床单啊？”

呕吐出来的脏东西从枕头上缓缓地流到床单上——灰绿色的，还带有几丝橘红色。像未煮熟的蛋清一样慢慢地流动，倔强地粘作一团，很难清理。我心想，这东西怎么会既规整又恶心呢？

母亲仍在嘀咕。她并不是在和我说话，她是在和呕吐物说话。但她用我的名字称呼它：克劳迪娅。她尽量把脏物清理干净，并在大片潮湿的地方铺上一块旧毛巾，我重新躺下。堵窗户缝的破布掉出来了，冷风又吹了进来。我不敢再叫她，也不愿离开已经焐热的地方。母亲生气时总让我感到羞愧；她的话很刺人，我只会哭。我不知道她并不是对我生气，而是对疾病生气。我相信她认为我软弱，让疾病“控制”了我。慢慢地我就不生病了；我拒绝

生病。但此刻我还在哭。我知道我流了好多鼻涕，但我无法停止下来。

姐姐进来了。她眼里充满了悲伤。她唱歌给我听：“当黑紫的夜幕降临在昏昏欲睡的花园围墙上时，有个人儿在想念着我……”我困得睁不开眼，但仍想着黑紫的梅子、围墙，以及“那个人儿”。

可是往事真是如此吗？和我记忆中一样的痛楚吗？不完全如此。或许是一种导致成熟的痛楚。爱像枫树蜜一样稠密，慢慢地涌向窗户缝。我闻着它，尝着它——甜甜的，带一点霉味，又带一点冬青油味——爱充满了整个房子。爱跟我的舌头一起，粘在带霜的窗户上。她和按摩乳膏一起覆盖着我的前胸。当我睡着把被单蹬掉时，嗖嗖的凉风让我想起她的甜蜜。午夜时分，当我又干咳起来时，脚步声进入了我的房间，大手把被单和被子重新掖好，在我的额头上停留了一会儿。因此当我回想起秋季时，我想起的是某人的双手，想起她不想让我死去。

亨利先生来时也是个秋季。他是我们的房客。我们的房客，这几个字眼像气球似的被越吹越大，在上空飘游——无声无息，但不断地给人愉快的神秘感。我母亲在谈论他的到来时充满了安详与欣慰。

“你们都认识他，”她对朋友们说，“亨利·华盛顿。他一直住在十三街的德拉·琼斯小姐那儿。但她现在已经老得自顾不暇。因此他目前正在寻找新的住处。”

“是啊。她的朋友们并不掩饰他们的好奇心；我还在纳闷他在她那儿还要住多久。他们说她已经老得不行了。多半时间不知他是谁，对其他人更分不清了。”

“她嫁的那个老黑疯子让她脑袋更糊涂了。”

“你听说他离开她时说什么了吗？”

“没有。说了什么？”

“他和从埃里瑞来的贱妞佩琦一起跑了，你知道吗？”

“是那懒婆娘老贝西的女儿吗？”

“就是她。有人问他为什么离开德拉那样一个虔诚的教徒去和一个小母

牛混在一起。你知道德拉总是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说他向上帝发誓他无法再忍受德拉用的紫罗兰水。他说他喜欢带女人味的女人。他说德拉是个洁癖，他受不了。”

“这个老狗，太损了。”

“你说说，这是什么逻辑。”

“什么逻辑也不是。有些男人就是狗。”

“这是她得中风的原因吗？”

“一定有关系。可你知道，那些女孩儿脑子也不对头。还记得老是傻笑的海蒂吗？她脑子从没正常过。她们的姨妈朱莉亚还常在十六街上走来走去，自言自语。”

“不是把她关起来了吗？”

“没有，县里不收她，说她不会伤害任何人。”

“可她伤害我了。你要是想尝尝受惊的滋味，你就像我一样早上五点半起来去看那老女人戴着草帽从你身边飘过。上帝保佑。”

他们笑了。

弗里达和我正在洗罐头瓶子。我们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但我们尽量地想听见大人們的谈话。

“但愿等我老糊涂时别让我像她那样满街游荡，丢死人了。”

“他们准备怎么安置德拉？她没有亲属吗？”

“她的一个妹妹要从北卡罗来纳来照顾她。我猜她是想占她的房子。”

“别这么说，我可从没听说过这样恶毒的话。”

“你打什么赌？亨利·华盛顿说她妹妹已经有十五年没见德拉了。”

“我也想过亨利可能会娶她。”

“娶那个老女人？”

“亨利也不年轻啊。”

“但他也不是老态龙钟啊。”

“他结过婚吗？”

“没有。”

“怎么回事？难道他那玩意儿被人割掉了么？”

“他只是很挑剔。”

“不是他挑剔，你看看周围有你瞧得上的么？”

“哼……没有。”

“他这是叫有头脑。工作踏踏实实，做人实实在在。希望能和他处得好。”

“会的。你收他多少钱？”

“半个月五块钱。”

“对你是笔不小的收入。”

“可不是嘛。”

他们的谈话如同一场稍带些邪恶的舞蹈：声音、相会、行礼、旋转，然后后退。又一个声音加入，但却被下一个声音盖过；两者互相追逐，然后中止。有时音量盘旋上升；有时则忽高忽低，但总是伴有朗朗的笑声。弗里达和我很清楚他们要表达的情感。而我们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他们话语的含义，因为我们才九、十岁。因此我们总是观察大人的表情，手势，腿脚，并在音色中寻找答案。

因此，当亨利先生周六晚上到来时，我们特别留心他身上的气味。很好闻。像树叶味、柠檬雪花膏味、香香的头油和香水味。

他老是笑嘻嘻的，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牙和一条友善的中缝。没有人把弗里达和我介绍给他，只是朝我们这边指了指，就像说这是浴室，这是壁橱，这是我的两个孩子，弗里达和克劳迪娅，当心这扇窗子，不能完全打开。

我们斜着眼看他，不说话也不期待他对我们说话。以为他会点点头，就像在壁橱前点头那样，表示看到我们了。但出乎意料，他对我们说：“你们好。你一定是格里塔·嘉宝，你一定是金吉·罗杰斯。”

我们咯咯地笑了。连我父亲愣了一下之后也笑了。

“想要一分钱么？”他手心里放着一枚亮晶晶的钱币。弗里达低下头，高兴得不知说什么。我伸出手去拿，但他用拇指和食指打了个响，钱币不见

了。我们又惊又喜。我们把他全身摸了个遍，用手指掏他的袜子，翻他上衣的内衬。如果快乐意味着充满信心的企盼的话，那我们当时非常快乐。我们企盼硬币再现，我们知道这种游戏让爸爸妈妈也感到有趣。爸爸笑了，妈妈的目光变得柔和了，随着我们的手在亨利先生的身上搜寻。

我们喜欢他。甚至在发生了以后的事之后，我们的记忆里也未留有对他的恶感。

她和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弗里达睡在外边，因为她胆子大——她从未想过她睡着时手耷拉在床边，会有“东西”从床底下爬出来把她的手指咬掉。我靠着墙睡，因为我想过那种可能性。因此，佩科拉只能睡在我们俩中间。

妈妈两天前告诉我们有一个“案例”要来——一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儿。县里把她安排在我们家住几天，等候决定如何安置她，更确切地说等她能和家人团聚。我们要对她客客气气，不要和她打架。妈妈不知道“那些人怎么了”，但那条“狗”布里德洛夫把他自家的房子烧了，把他老婆气得要发疯，因此，全家人只能在露天过夜。

在露天过夜，我们可知道那是最可怕的事了。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常有此种威胁。任何形式的消费无度都会导致在野外过夜。比如有人吃喝过度，他就可能在露天过夜。如果有人用煤过度，他也最终在露天过夜。有人因为赌博、酗酒而露宿野外。有的母亲会把儿子关在门外。当发生此类事件时，不管那孩子干了什么，大家都会同情他。他被拒之门外，而关他的是他自家人。被房东赶到门外是一回事——虽属不幸，但这是你无法控制的，因为你无法左右你的经济来源。但因自身懒惰而使自己露宿野外，或忍心将亲骨肉关在门外是另一回事——那是犯罪。

出门和被赶出门是两码事。出门，你能到别处去，但被赶出门，你便无路可走。这两者的区别虽微妙但后果截然不同。被赶出门意味着某件事情的终结，不可挽回，是一个物理事实，界定和补充着我们的生存状况。由于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少数，我们总是处在生活的边缘，拼命巩固这种脆弱的地

位，并期望附属于或慢慢挪向生活的中心地带。然而，我们在这种边缘生活中学会了如何应付，大概因为它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但被赶出门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则完全不同——就像生与死两个概念的差别一样。事实上被赶出门等于死亡。死亡是不能改变的，被赶出门的现象会继续存在下去。

意识到有被赶出门的现象存在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对财富和拥有的渴望。对院子、门廊，对带有葡萄架的凉亭的占有。拥有财产的黑人把他们的精力和热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在巢穴上。就像受惊绝望的鸟儿，他们过度地装点一切；对他们好不容易挣得的一份家产尽心尽力地守护；整个夏天都忙碌着在吊柜和货架上堆满自己腌制的食品；他们把家里所有可油漆、可折腾的角落都折腾一遍。因此这些房子和那些出租房屋相比就像一排排从野草丛里高高地探出头、经过精心护理的向日葵。在出租的房子里住着的房客偷偷地瞧上几眼这些属于房主的院子和门廊，更坚定了他们为自己买“一所像样的小房子”的决心。同时，他们在租用的房子里省吃俭用，积攒财物，期盼着拥有财产的那一天。

乔利·布里德洛夫就是一个住在出租房子里的黑人。当他把自己家人赶出门之后就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与牲畜为伍，确确实实地变成了如同老狗、毒蛇、耗子一般的黑鬼。布里德洛夫太太住在她干活的主人家里，儿子山姆和另一家人住，而佩科拉则和我们住；乔利被关进了监狱。

她来时一无所有。没有带装着换洗裙子、睡衣，或两条白布内裤的小纸口袋。她跟着一位白人妇女进来之后就坐下了。

佩科拉住在我们家的那几天很愉快。弗里达和我也不打架了，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位客人身上，想方设法不让她感到她无家可归。

当我们肯定她不想压我们一头时，我们就习惯她了。我们装扮小丑时她会开心地大笑，我姐姐给她吃的，她会很有礼貌地接受下来。

“你想吃苏打饼干吗？”

“无所谓。”

弗里达给她端来了一盘苏打饼干和一杯牛奶。牛奶盛在蓝白色的印有雪莉·坦布尔头像的杯子里。她喝牛奶喝了很长时间，看着雪莉·坦布尔带有

酒窝的头像时充满爱慕之情。弗里达和她就雪莉·坦布尔如何可爱谈得很投机。我不能苟同她们的崇拜之情，因为我恨雪莉。并不是因为她可爱我才恨她，而是因为她与波彦格尔一起跳舞。波彦格尔是我的朋友，我的叔叔，我的父亲，他该和我一起跳舞，一起欢笑才对。而他却和一个白人小姑娘一起玩耍，一起跳舞。那些白人女孩子的袜子从不脱落到后脚跟下。我就说：“我喜欢珍妮·威特斯。”

她们不解地瞧了我一眼，觉得我不可思议，继续谈论着眯缝着眼的雪莉。

我比弗里达和佩科拉年纪小，还未达到能让我喜欢她的心理发育转折点。当时我感到的只是单纯的仇恨。但在此之前，我曾有过一种更为奇怪、更为可怕的对世上所有的雪莉·坦布尔们的仇恨。

那是从圣诞节和礼品娃娃开始的。圣诞最贵重、最特殊、最可爱的礼物总是蓝眼珠的大娃娃。从大人們的啧啧声中我知道他们认为娃娃代表着我的最大愿望。我对布娃娃和她的外貌感到困惑。我该拿她怎么办呢？假装我是她的妈妈？我对带孩子和做母亲都不感兴趣。我只对和我同龄、和我同样身高的人感兴趣。当母亲的前景无法使我产生激情。当母亲意味着年老，意味着其他远不可及的可能性。然而，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期望我如何对待布娃娃：拍打她，设想各类与她有关的情景，甚至与她一起睡觉。小人书里尽是女孩子与娃娃睡觉的画面。一般都是布娃娃，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对那双傻呆呆的眼睛、大扁脸、橘红色头发感到厌恶，感到恐惧。

其他的布娃娃不仅没有给我带来快乐——恰恰相反，当我和娃娃一起上床睡觉时，它那僵硬的四肢抵着我的皮肉——带肉坑的手上伸出的纤细手指总是把我刮痛。当我睡着翻身时，冰凉的娃娃头总是与我的头相撞。在睡觉伙伴中它是最让人不舒服、最欺负人的了。抱娃娃时也不让人感到愉快。浆过的裙子花边让人无法紧紧拥抱她。我只有一个愿望：把娃娃拆了，看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发现它的可爱之处，美丽之处，发现我不钟爱娃娃的原因。显然，我是惟一不喜欢娃娃的人。大人们、大女孩们、商店、杂志、报纸、橱窗——全世界都一致认为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蓝眼珠、黄头

发、粉皮肤的布娃娃。他们会说：“看，这个漂亮的娃娃。如果你今天表现好，就给你。”我用手指摸着它的脸，纳闷地看着它那两道细眉，摸着它两片红嘴唇之间露出的像琴键似的白玉牙齿，摸摸它的小翘鼻子，抠抠它亮亮的蓝眼珠，用手指卷卷它的黄头发。我无法喜欢它。可是我可以把它检查一下，看是什么原因让大家一致认为它是那么可爱。拗断它的细手指，弄弯它的平脚板，弄乱它的头发，拧歪它的脖子，那东西只发出了一声声响——被大家认为是最甜蜜的叫“妈妈”声，但我听起来像是快死了的小羊羔发出的绝叫——更准确地说，像是七月里打开冰箱时因铰链生锈而发出的声音。当把它又凉又傻的眼珠抠出来时它还会叫“啊啊……”当把它的头拧下来，把木屑倒出来，在铜床头架上把它的后背打断时它还会叫。撕开棉纱网我看见了带有六个小孔的铁片，这就是它出声的秘密。只不过是块圆铁片。

大人们皱着眉头唠叨说：“你什么也不爱惜。我一辈子也没有过一个娃娃，从小就哭着闹着要一个。现在你有了，一个漂亮的娃娃，你却把它毁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们表现得很愤怒。眼泪似乎要冲走他们长辈的威严。他们的嗓音里充满了积蓄多年未了的渴望。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那些娃娃都毁了，但我知道从来没人问过我圣诞节要什么礼物。如果那些有能力满足我愿望的大人能相信我的话，能征求我的意见，他们就会知道我什么都不要，不想拥有任何东西。我只是想在圣诞节那天拥有某种感受。他们该这样问我：“亲爱的克劳迪娅，圣诞节你想怎么过？”我就会说：“我想坐在大妈厨房里的矮凳上，腿上放满丁香花，听着大伯给我一个人拉提琴。”矮凳适合我的身材，大妈温暖的厨房使我感到安全，浓郁的丁香、优美的琴声，当然会调动我所有的感官，之后最好再给我吃个桃子。

然而我尝到闻到的却是令人倒胃口的招待客人用的锡杯锡盘的味道。这些饮茶聚会让我感到厌烦。我也讨厌穿新裙子，因为在穿之前必须在镀锌铅盆里洗个澡。滑进澡盆，未等全身浸湿水就凉了，连痛痛快快地光着身子玩一会儿的时间都没有，只有时间让层层肥皂水从两腿之间流下去。然后是硬硬的旧毛巾。身上的脏土洗掉之后让人感到不自在，感到毫无掩饰。清洁让

人烦恼，不给人任何想像的余地。腿上、脸上的墨水印不见了，一天积攒下来的创作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鸡皮疙瘩。

我毁了不少白洋娃娃。

但是，真正令人恐惧的不是拆毁这些布娃娃，真正令人恐惧的是将这种冲动转移到白人小女孩身上。我完全有可能不动声色地用斧子砍她们，而且对此有强烈的愿望。我想解答自己的疑问：她们吸引人的秘密在哪里？是什么魔力让大家看到她们时就会说“哇……”而对我却不会这么说？黑人妇女在街上走近她们时会将目光移向她们，抚摸她们时也格外轻柔。

如果我拧她们一下，她们的眼睛——和布娃娃的亮眼珠不同——会痛得闭上，她们的叫声也不像冰箱门发出的声音，而是令人陶醉的痛苦之声。当我懂得这些冷酷的残暴是多么可憎时——因为冷酷，所以可憎——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必须寻找藏身之地。最好的躲藏之地就是仁爱。这就是从原始的残暴到后天的仇恨到虚假仁爱的转变。这是向雪莉·坦布尔靠拢的小小一步。很久之后我变得崇拜她了，也变得爱干净了，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些变化只是调整而不是改进。

“三夸脱 牛奶。昨天还在冰箱里。整整三夸脱。现在没了。一滴也没有了。我不心痛别人进来拿他们爱吃的东西，但那是三夸脱牛奶啊！见鬼了，谁能喝得下三夸脱牛奶啊？”

我母亲所说的“别人”是佩科拉。我们三人，佩科拉，弗里达和我，听着她在楼下厨房里唠叨着佩科拉喝奶之事。我们知道她喜欢印有雪莉·坦布尔头像的杯子，一有机会就用它喝牛奶，好摆弄和欣赏雪莉的甜脸蛋。我母亲知道弗里达和我讨厌喝牛奶，猜想佩科拉是因为贪杯才喝那么多奶。我们当然不敢和她“争辩”。我们和大人说话时不能先开口；我们只有答话的份儿。

我们默默地望着，为朋友所承受的屈辱感到羞耻：我抠着脚指甲里的黑泥，弗里达用牙把手指甲啃干净，佩科拉用手指摸着膝盖上的疤痕，头歪向

① 1夸脱 = 1.1365 升——译注。

一边。我母亲独自唠叨总让我们感到厌烦，感到压抑。她没完没了，令人屈辱，尽管不是直截了当（妈妈从不指名道姓——只是说别人或有人怎么样），仍然十分伤人。她能连续唠叨上几个小时，从一件事联系到另一件，直到把所有让她懊恼的话都说尽为止。等她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骂够了，她会突然唱起歌来，一直唱到天黑。但是她的歌声总是姗姗来迟。在歌声到来之前，我们总是心神不定，脖子发烧，竖起耳朵，不敢看人，抠脚指甲泥或干什么别的事。

“……我不明白我的家成了什么了，大概成了慈善堂了。该是我接受恩惠而不是给与恩惠的时候了。大概我不该拥有财富，而该进贫民院。看起来不管怎么着我终归要进贫民院的。有些人整天算计着如何把我送进贫民院。别人没饭吃与我有什么相关。要养活一大家子不进贫民院还不够难为我的，还要给我添一口，非要把我喝穷了。不行，她绝对办不到。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有一张嘴。什么事情都不能太过分了。我可不是富得流油。谁也不需要喝三夸脱的牛奶。亨利·福特也不需要喝三夸脱奶。这简直是造孽。我是乐于助人的，没人敢说我不乐意。但这种事该结束了，该由我来了结这桩事了。《圣经》里说既要闭目祈祷也要睁眼观察。有人把孩子往我这里一推了事，也没人来瞧瞧那孩子是否有饭吃。以为他们会想着来瞧瞧我是否会给他们孩子饭吃。错了，他们连想都不想。乔利那不值钱的老东西出狱都两天了，也不来看看他孩子是死是活。她死了他都不在乎。她妈也一样，都是些什么人哪？”

当妈妈骂到亨利·福特和那些根本不在乎她是否有饭吃的人时，我们知道该离开了。我们不想听她说罗斯福和教会夏令营的事。

弗里达起身往楼下走，佩科拉和我跟着她，绕了一个圈尽量躲开厨房门。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只能隐约地听到母亲的话语。

那是个令人寂寞的星期六。屋子里充满了石脑油和绿芥末呛人的味道。星期六总是让人感到寂寞，妈妈唠唠叨叨，还要用肥皂水洗澡。其痛苦程度仅次于星期日，因为星期日是立规矩、喝药水的日子，整天听到的就是“不许这样，不许那样”和“好好坐着”。

如果母亲心情好，情况就不那么糟。她会唱歌，唱些诉说艰难岁月的歌，唱些年轻人相爱又别离的歌。她的嗓音是那么甜美，她的目光是那么醉人，我发现我很渴望那些艰难岁月，渴望能生长在那“身无分文”的年代里。我渴望经历我的“心上人”离我远去激荡人心的时刻。我“不愿看见太阳渐渐落下……”因为我知道“我的心上人已经离去”。我母亲多彩的嗓音给悲痛带来了色彩，将歌词里的痛苦抹去，使我相信悲痛不仅是忍受的，悲痛也是甜蜜的。

然而，如果没有歌声，星期六就会像沉重的煤筐压在我头上。如果妈妈再唠叨的话，就像她现在这样，星期六就更让我头痛了。

“我穷得丁当响，他们当我是什么人啦？圣诞老人吗？他们还是把礼品袋摘下来好，因为现在不是圣诞节……”

我们坐不住了。

“我们去玩吧。”弗里达说。

“你想玩什么呢？”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没什么好玩的。”弗里达瞧着树梢，佩科拉注视着她的双脚。

“你们想到亨利先生的房间里去看他的女人杂志吗？”

弗里达作了个鬼脸。她不愿意看下流的图片。我继续说：“那么我们可以看看他的《圣经》，很漂亮的。”弗里达吸了口气，用嘴唇发出“弗弗”的声音。“那么，我们去给那半瞎的太太穿针。她会给我们一分钱的。”

弗里达反驳道：“她的眼睛湿乎乎的，我不愿意看她眼睛。佩科拉，你想干什么？”

“我无所谓，”她说，“只要是你们想玩的。”

我又有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上街去看看垃圾桶里有什么好玩儿的东西。”

“太冷了。”弗里达说。她感到乏味且不耐烦了。

“我知道了，我们可以做软糖吃。”

“开什么玩笑？妈妈还在唠叨呢。当她能对墙唠叨时，你知道她会唠叨

一天的。她不会同意的。”

“那么，我们到希腊旅馆去听他们骂人。”

“谁爱去那儿啊？他们老是骂那么两句。”

我能想到的主意都说了，开始注视指甲上的小白点。白点的总数象征着我未来男朋友的总数。七个。

妈妈的独白声小了。“……《圣经》里说要给穷人饭吃。那是对的，该那么做。可是我不是在喂大象。……能喝三夸脱奶的人不该住在这里。他们找错地方了。把这里当什么了？当牛奶场了？”

突然，佩科拉跳了起来，瞪大了的双眼里充满了恐惧。嘴里不停地哼哼。

“你怎么啦？”弗里达站了起来。

我们同时朝佩科拉目光注视的地方望去。鲜血从她的腿上流下来。台阶上已有几滴。我跳了起来，“你把腿刮破了吗？看哪，裙子都染了。”

褐红色的血迹印在裙子上。她不断地哼哼，分着两腿。

弗里达说：“噢，上帝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佩科拉将手指放在嘴里。

“这是月经。”

“月经是什么？”

“你该知道。”

“我会死吗？”她问道。

“不会的，你不会死。这只是说明你能生孩子了！”

“什么？”

“你怎么知道的？”我最烦听弗里达说她什么都知道。

“米德丽告诉我的。妈妈也说过。”

“我不相信。”

“不相信拉倒。傻子，听着，在这里等着。坐下来，佩科拉，坐在这里。”弗里达话音里带着权威感与兴奋，“你，她对我说，‘你去弄点水来。’”

“水？”